

跨黨派小組在兩岸關係發展過程的角色與意義

顏建發 / 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

由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先生所召集的跨黨派小組在11月26日所召開的第七次會議獲得了「三個認知，四個建議」的共識。此共識的主要內容大略是，確立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來回應對岸「一個中國」的主張，並強調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與互不代表的現狀，而若欲更動現狀，必須經由民主程序取得人民的同意。同時，共識也呼籲以最大誠意與耐心建構兩岸新關係。不過儘管跨黨派小組內部的共識形成不易，但外界的回應卻是兩極的。

首先，當天電子媒體即報導國內反對黨的嚴詞批評，認為跨黨派小組刻意迴避「一個中國」原則，所得的共識是一堆廢話。相反地，11月29日民進黨中央黨部中常會無異議通過決議，表達對跨黨派小組所獲致的共識的支持。總統府方面固然低調處理，但基本上也給與肯定。緊接著，11月30日，中國國台辦新聞局局長張銘清以相近的口吻「不三不四」、「空話」和「廢話」嚴加批評，並含沙射影地批判「兩國論」。由於跨黨派小組的基本任務在於提供陳水扁總統有關發展兩岸關係的諮詢意見，因此北京當局不願給跨黨派小組半點肯定，實際上等於間接反應出，北京仍不願給陳水扁政府一點空間的心態。

然而有趣的是，12月3日一份由台灣國家和平安全研究協會所進行的民意調查卻指出：63%的受訪者同意「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互不代表」；67.8%的受訪者贊成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來增進兩岸關係，處理兩岸爭議，以及回應對岸「一個中國」的主張；86.4%的受訪者同意「現狀改變必需經由民主程序取得台灣人民的同意」；有90.4%受訪者認同中華民國的國際尊嚴與生存空間應受尊重，並期待中共放棄武力威脅，共商和平協議；有67.9%認為中共沒誠意和平解決兩岸問題；70.4%不贊成國台辦對跨黨派小組的批評。

上述的強烈對比顯示：要獲取中共的信任比登天還難，而台灣內部共識的取得也相當不易。不過，雖然北京對「三個認知，四個共識」雖不留餘地批判，但卻未在這個議題上對李遠哲院長有所批評。顯示，北京還留有轉圜的空間，而期待透過對「事」的批判來對「人」形成一種壓迫。

選前，由於李遠哲挺身而出支持陳水扁，而招致北京嚴厲的批判，但幾經李遠哲透過媒體的辯解，北京方面開始出現軟化。尤其是李遠哲在跨黨派小組的開幕演

講中提到，「我一直認為，台灣應該繼續表達和平的善意與決心。在尊重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國際尊嚴與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我們應該回到1992年『各自以口頭聲明的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承認在此共識下達成的協議與結論，並在既有的基礎上恢復協商。」這一點令北京方面感覺李遠哲的立場是較接近的，而開始對李遠哲重新評價。不過，不管如何，北京對李遠哲仍採「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而除非李遠哲繼續「輸誠」，否則中國共產黨應不會善罷甘休。

然而，問題是北京方面習慣將問題的解決寄託在某個「個人」身上，實際上是不切實的。李院長固然會努力在跨黨派小組內取得全體委員對他的理念的支持，並說服總統府接受。不過，李遠哲的風格是尊重民主程序的，他無意將個人意見強加於跨黨派小組，這一點在幾次開會的過程中，他一再重複表示。因此，理論上他的立論必須與跨黨派小組加以區分。換言之，他在9月2日跨黨派小組的第一次會議當天的演講詞中的主張仍屬個人意見，尚非成為小組的共識。「三個認知，四個建議」就某種意義即是一種煞車，離李遠哲的講詞仍有一段距離。

不過，不管如何，李遠哲的思想與主張在國內的政治意見的光譜定位點上正好介於國統會與陳水扁之間的中間位置，自有其一定的揮灑空間與潛力。對比來看，國統會在民國81年8月1日第八次會議曾通過：「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而陳總統在六月二十日的演講詞中再度公開宣示，「只要兩岸兩會的接觸、對話、乃至協商與協議，只要有結論，只要有共

識，都是既有的基礎，我方願意在此之上，以善意營造合作的條件，共同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在這兩端的意見之間，李遠哲顯然是位居中間立場，他的主張是：「回到1992年『各自以口頭聲明的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承認在此共識下達成的協議與結論，並在既有的基礎上恢復協商。」

相對於國統會的主張，李遠哲的論述看似相近，實際上卻仍有些微差距。國統會對「一個中國」的「形式」(form)認同，但對「內容」(contents)持異議。李遠哲的主張，就實際的過程來看，是以「口頭」而非「文字」的方式聲明，另外，透過各自的表述，可能連對「一個中國的原則」的形式本身的詮釋也出現「複數」而非「單數」的樣態。

至於陳水扁所謂的「共同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其中「共同處理」意涵其對「一個中國」的對待是視之為「議題」而非「前提」，兩岸關係也必須是對等的；同時，在時態上是「未來式」而非「現在式」，與李遠哲有一定的差距。

然無論如何，基於國內與兩岸複雜的關係看來，李遠哲的居中立場與主張，應有一定的揮灑空間。尤其是，在辜振甫之後，本省籍的台灣人中較能被北京信任，份量夠，且有淵源的人，嚴格講並不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12月15日便有一則廣播提到：「大陸台灣研究人士認為，跨黨派小組的三個認知，四個建議，是統派向獨派妥協的結果。他們儘管對此持否定態度，但是對於李遠哲先生為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良好願望以及他所做的努力，給予正面肯定。」

當然，北京的讚賞對李遠哲而言，在台灣內部不見得是加分，但也不見得全然是負分。另一方面，李遠哲原本要贏得國內在野黨的同意並不容易，畢竟兩千年總統大選他已與其他在野黨結下樑子。不過，北京的讚賞或多或少讓一些大中國意識的在野黨對李遠哲的觀感稍有改觀。而撇開這些政治力的評價與糾纏，其實，李遠哲的另一個市場應是「民間」，他或許應致力於獲取民間的支持。

以當前兩岸的僵局看來，兩岸關係的出路幾乎是無解的。然而，我們對跨黨派小組這一機制的期待，若不止著眼於「解決」問題，而換個心情來期待，其實它多少具有對問題發展的方向加以「控制」的功能。或許，以一個平凡的角色來期待，

反而會有一種意想不到的後果。跨黨派小組可以充分定位在民間觀點，它也可以針對兩岸的長程關係勾畫一個遠景；沒有遠景，所謂的維持現狀將充滿不安定感。而小組如能在會議進行過程，逐漸發展出一種台灣社會難得一見的相互尊重的文化，進而使成員得以理性溝通與對話，那麼，這個會的召開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最佳的民主示範。外在的期待與批判之聲本來即無法避免。而換個角度來看，或許，壓力本身正是此小組必須力求討論品質「向上提升」的動力。然而不管如何，終究兩岸的接觸仍需落實到既有的官方授權的協商管道。小組仍須清楚，它只是一種諮詢機構而非決策機構。如此，才不致於承擔過多不實的期待與不公的評價。